

國家與工人階級的形成*

“

工人階級形成的路徑、模式，以及工人運動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是由國家的政治結構和制度安排所決定的。如果工人階級的形成必須體現在意識、組織和行動三個層面，那麼，其中的每一個層面都會受到「國家因素」的直接影響。不同的政治結構和制度安排，是解釋各國工人階級形成模式與道路差異的重要變數。工人運動興起時所面臨的不同的制度環境和國家對工人運動的不同制度反應，形塑了工人運動的不同訴求（社會政治改革還是經濟主義）、不同的訴求對象（政府還是雇主），以及表達訴求的不同方式（激進還是溫和、政治的還是經濟的）。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具有版權的資料

中國的經濟改革帶來了一場波蘭尼 (Polányi Károly) 意義上的「大轉變」，即市場已成為建構和驅動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這場大轉變的一個最深刻的後果，就是中國工業關係的改革和重構以及工人階級的再造。中國工人階級的轉型引起了國內學者對「工人階級的形成」這一西方經典學術話題的濃厚興趣，以及其在中國的意義的思考。¹

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視工人階級的形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附屬現象，認為階級結構是一種客觀存在，而階級形成便是階級結構的邏輯結果。一個典型的表述是：「階級是整個生產過程的函數」。²英國歷史學家湯普森 (E. P. Thompson) 批評了這種經濟決定論 (economic determinism) 和結構簡約論 (structural reductionism) 的觀點。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傾向的歷史學家，湯普森並不否認經濟結構是階級形成的客觀條件，但他認為，工人階級的形成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不能歸結為經濟關係的衍生物。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這一巨著中，湯普森力圖證明這樣一個觀點：「階級的形成……是外部決定因素和自我行動的交集。工人階級『塑造自己，同時又被塑造』」。他認為「我們既不能把階級簡化成一個靜止的『階層』，也不能把它當作是一種特定生產方式的函數，因為階級形成和階級意識是一個持續的『關係過程』」。³因此，在湯普森看來，在解釋工人階級形成時，必須考察生產過程以外的因素，如歷史、文化、個人經歷、生活方式、宗教傳統乃至儀式習俗。⁴總之，要了解工人階級的形成，必須對工人的實際生活進行考察。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湯普森的著作使得西方學界對工人階級形成的研究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極大地拓展了這一研究的領域與視野。深受湯普森研究傳統的影響，許多西方學者意識到只有「重新回顧過去的鬥爭經歷」，才能「理解現在的政治生態」。⁵因此，他們開始重視對階級經歷的研究，試圖通過重新建構工人們當時的生活模式來解釋階級的形成。在過去幾

年，這一研究傳統也影響了海內外學者對中國工人階級的研究。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意識形態遺產、舊體制下的生活經歷、社區結構、地域和身分認同等等，都進入了學者的研究視野，⁶豐富了我們對中國工人階級形成的理解。

但是，國內學者在介紹西方工人階級形成理論時，似乎忽略了這一研究傳統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視角，即國家在工人階級形成中的作用。在湯普森本人的研究中，「國家」因素雖然時有提及，但並不占有重要的地位，這或許是因為他基本上是一個「文化建構主義者」，通過敘述「階級經歷」(class experience)來建構階級是他偏好的研究視角。但自湯普森以來有關工人階級形成的文獻中，有不少研究(主要是政治學家和政治社會學家的研究)特別關注國家的角色，強調國家對工人階級意識形態、工人運動模式以及策略的關鍵影響。如果按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卡茲尼爾森(Ira Katznelson)所說，階級的形成必須體現在社會結構、生活方式、意識傾向以及集體行動四個層次，⁷那麼至少後兩個層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家因素的制約和影響。湯普森在分析階級形成時特別強調「階級經歷」的重要性，但如同本章將要介紹的，許多研究證明，「階級經歷」必定包含著工人與國家的互動，更有學者指出，工人階級意識和階級認同的產生與國家的勞工政策直接有關。國家視角的重要性還在於，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國家角色是解釋各國工人階級形成的路徑和模式差別的一個重要變數。湯普森的研究只是基於英國一個國家，雖然他所強調的歷史、文化、經歷等因素有相當大的普遍意義，但他的理論並不能解釋西方各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殊異之道。為何歐洲大陸國家的工人運動激進、有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而英國、美國的工人運動相對溫和而保守？為何在經濟、文化和法律背景基本相同的英國和美國，前者的工人階級有強烈的階級意識，而後者則沒有？前者主張通過立法進行社會、政治改革，而後者則推行以行業和企業集體談判為主的「商業工會主義」？

社會學家李普賽特 (S. M. Lipset) 曾認為，至少有十幾個變數可以用於解釋西方工人運動的差別。⁸但在諸多的影響變數中，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國家」是最關鍵的一個，因為國家設定了工人運動的制度框架，是工業關係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其對工人階級形成的形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強調國家制度在階級形成中的作用的研究思路，也反映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科學研究中出現的兩個重要學派的影響。一個是所謂「國家中心」理論 (state-centered theory) 學派。這學派一反社會科學研究中長期占主導地位的、以社會為中心的傳統，強調國家是解釋社會發展和變遷的獨立變數。過去二十多年，社會科學研究中許多出色的成果，都源於這一傳統。必須提到的是，由彼得·埃文斯 (Peter Evans) 等主編的、宣告這學派誕生的《把國家帶回來》(*Bring the State Back In*) 一書，收入了卡茲尼爾森從國家角度比較英、美工人階級形成的著名論文。另一個學派是新制度主義。簡單來說，這學派認為制度 (包括具體的制度架構、規則、規範、機制等) 制約和形塑人群和組織的行為。在任何社會中，國家是「制度」的主要創立者和體現者，因此，從國家制度安排的視角看問題是可以解釋許多「結果」(outcomes) 的。

國家本身是一個內涵豐富、層次很多的概念，因此，西方學者對國家在工人階級形成中的作用的探討也是多方面的。本文將工人階級形成這一研究領域中的國家視角，歸納成三個方面：國家結構和政權特性 (國家權力的集中程度和壓制性)、公民權利安排 (普選權的實施和政治參與) 和國家的制度設計 (聯邦制和單一制，以及司法機構的地位)。考察學者是如何從這幾個角度分析國家在階級形成中的作用。在結論部分，本文討論西方文獻對研究中國工人階級問題的啟發。

國家結構與政體類型：「強」國家與「弱」國家

在觀察西方工人階級形成的差別時，許多研究者認為，國家結構 (state structure) 是一個必須強調的原因。政治學者左爾伯格 (Aristide Zolberg)⁹ 在綜述這一觀點時指出，國家從結構上可分成強弱兩種類型，而國家的強弱程度，可用「國家性」(stateness) 這一概念來表示，強國家就是指「國家性」強的國家。¹⁰「國家性」的關鍵是國家行政集權的程度。從這個角度看，法國和德國代表了「國家主義的社會」(statist societies)，具有較高的集權程度；而美國和其他英語國家別屬於「非國家主義社會」(nonstatist societies)，其特徵是權力十分分散。現存文獻中一個普遍的假設是：「國家性」程度愈強的國家，愈易於產生針對國家的激進的工人運動。這個假設最初由凡爾·羅文 (Val Lorwin) 提出。他認為，由於法國國家有著很強的「國家性」，即專制主義的國家行政權力高度集中，掌握關鍵資源的分配，對工人的組織和生活都能施加較大影響，而「愈依賴於國家的工人運動也容易對國家產生敵意」。¹¹ 查里斯·悌利 (Charles Tilly) 在其著名的《法國人民抗爭史》(*The Contentious French*)¹² 一書中亦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認為，隨著十九世紀法國中央政府行政權力的日益集中，以及同資本權力的結盟，工人運動愈來愈明確地針對國家，創造出新的組織和行動模式，包括具有政治意味的勞工協會、工會、公開示威，以及罷工。¹³ 換言之，早期法國工人運動強烈的無政府主義——辛迪加 (Syndicat) 主義傾向，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絕非偶然。在一篇討論國家概念的著名論文中，奈特爾 (G.P. Nettl) 也強調，歐洲大陸國家激進的工人運動與「強國家」有著很高的相關性。在他看來，「在強大國家裡更容易出現反制度運動並非是一種巧合」，因為「國家提供了一種方便的去身分化 (disidentification) 的工具」(即去除工人原有基於地域、族裔、宗教等形成的身分)，同時又促進了統一的政治身分的形成和統一訴求對象的出現。¹⁴ 相反，「國

家性」比較弱，是英國和美國沒有激進工人運動的主要原因之一。奈特爾認為這一思路可以追溯到馬克思 (Karl Marx)。馬克思是主張工人階級的暴力革命摧毀資本主義國家的，但他卻認為英國和美國並無暴力推翻國家的必要性，因為「那裡沒有國家讓人們推翻」。在奈特爾看來，馬克思這句話佐證了他的英、美兩國缺乏「國家性」的論點，在這兩個社會，「國家並非一個一目了然的自主行動的領域」。¹⁵左爾伯格對國家結構與工人運動的關係做了如下概括：¹⁶在政治領域高度集中的地方，部門或地區的衝突很可能快速指向權力的最高層；相反，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有著明確的制度分野和政治權力分散的地方，工人組織的目標通常是狹隘的，他們的行動一般只針對相關的制度部門。

國家結構的解釋視角無疑對工人階級形成的特點做出了很有意義的解釋，但缺陷也是很明顯的。首先，「國家性」這個概念缺乏明確的定義，其內涵不盡清晰。比如，卡茲尼爾森認為英、美都是「國家性」不強的國家，但兩國的組織方式不同，英國是單一制，行政權力相對集中；美國是聯邦制，權力相當分散，因而對工人運動有不同的影響。但是，在有些學者看來，國家行政權力集中恰恰是「國家性」的重要指標。那英國究竟是強國家還是弱國家？其次，「國家性」是一個靜態的概念，它反映了工人運動所處的、由國家結構所決定的客觀條件，但卻未能充分說明國家的哪些具體行為、以什麼方式造成了與工人運動的互動，從而影響了工人階級的形成。因此，有學者從國家對工人組織的態度和政策來看對工人階級形成的影響。他們認為，在西方工人階級形成的歷史過程中，曾經存在兩種政體類型 (regime type)，即專制的 (absolute) 和自由 (liberal) 的；¹⁷前者的邏輯特徵是擁有較強的鎮壓力量，能夠對工人運動實行高壓政策，而後者的則是人民自由和參與程度較高，傾向於與工人運動妥協。

不同的政體類型，以及它們對工人運動的方式導致了各國工人運動的不同發展。¹⁸這在歐洲大陸國家與英、美等英語國家的對比中可

以清楚看到。同國家行政集權易於造成工人運動激進化這一假設的邏輯一致，學者們認為國家對工人運動的壓制會產生同樣的效果。李普賽特認為，造成工人階級政治模式差別的唯一決定性因素是，當這一階級誕生時，它面臨的是專制的國家還是自由的國家；「國家對工人階級經濟和政治權利的壓制愈大，時間愈長，工人就愈可能對革命的學說做出正面的回應」。¹⁹蓋瑞·馬科思 (Gary Marks) 在研究中發現，²⁰國家壓制工人在勞動市場上聯合的權利 (即組織工會)，會使工人更深刻地體驗到經濟制度的不公正，產生強烈的被剝奪感，從而轉向激進主義。凡是工人在勞動市場的聯合權利長期受到嚴厲限制的國家，如德國、奧匈、俄國、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工會都被迫進入政治領域，試圖通過政治行動來爭取利益，因為他們意識到在政治遊戲規則改變之前，工會無法在市場上發揮有效的影響力。工會進入政治領域的直接後果之一是同左翼政黨結盟，正如列寧 (Lenin) 在評論沙皇俄國的情況時說：「專制的壓迫似乎是把社會民主黨組織和工會之間的任何區別都消除了」，²¹兩者共同面臨著改變政治現狀的任務。十九世紀中後期，德國工人運動更典型地反映了這一現實。1878至1890年，俾斯麥政府實施「反社會主義法」，嚴厲鎮壓社會主義思想和組織，工會亦被列為非法。這導致工會追隨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改造理念，形成了歐洲大陸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最強烈的工人運動，並在組織上也依附於社會民主黨。但一旦「反社會主義法」於1890年終止，工會活動獲得法律空間，其行動即逐步轉向溫和。雖然工會仍然信奉社會主義，但其含義已發生變化。在工會看來，「社會主義就是為自主的工會運動提供空間，讓工會以最直接的方式，即通過勞動市場，來改善工人的狀況」。²²與此同時，工會開始日益獨立於社會民主黨。

馬科思的另一個重要論點是，國家對工人運動的壓制促成了工人階級的同質性。按照馬克思的預言，只有當市場高度同質化時，工人的同質性才會形成。在歐洲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初期，工人階級是相當

缺乏同一性的。特別是工匠和熟練工為了保護自身狹隘的經濟利益，一向有排他性的行會主義傾向，希望利用他們在勞動市場的有利地位謀取利益。然而，馬科思則證明，在德國和其他歐洲大陸國家，是國家而不是市場，使得工人階級趨向同質化，因為國家對工人運動的全面壓制降低了用行會主義和小團體方式來維護特殊利益的可能性，導致所有的工人——不論來自什麼地區和從事什麼行業和工種——在勞動市場上處在基本相同的不利地位，從而強化了對國家的疏離感，促成了工人的同一性，而這種同一性是階級團結的基礎。歷史學家考克卡（Jürgen Kocka）對德國工人階級形成的研究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政府的監督和壓制不只是針對某個行業，而是工匠和工人的全體。這有助於他們產生工人的身分認同，而不再將自己視為某個特定行業或特殊技工群體的成員」。²³從這個意義上看，在市場高度同質化之前，國家的壓制客觀上已經催化了階級意識和階級認同的出現。這個邏輯同奈特爾講的強國家有「去身分化」的功能是一致的。

但在自由的政體下，國家對工人運動的態度和政策相對溫和，從而導致不同工人運動形態。以英國為例，工業革命初期，政府對工匠和工人在勞動市場的「聯合」（combination）是進行嚴格控制的，但並未達到完全禁止工會活動的地步，工匠和工人仍然可以通過「聯合」來保證現成法律的實施。1842年以後，英國政府不再禁止工人在勞動市場的聯合，工會被允許參與處理工資和勞動時間的問題，並且有權組織罷工。雖然議會仍然立法禁止工會使用「威脅、恐嚇、騷擾」等方式，雇主常以工會觸犯普通法中營業契約共謀而訴諸法庭。但總體而言，國家對工會的壓制是局部的、間隙的和非系統的，工會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國工會成員已達到一百二十萬，成為社會中舉足輕重的力量。但相對寬鬆的法律環境，使得英國強大的工會運動從未轉向激進主義（雖然有激進派別，但從未成氣候），而是一直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中，通過議會鬥爭和進步立法來達

到改善工人狀況的目標。穩定的、合法的工人運動，創造出了一個和現存秩序息息相關的工人領袖階層，領袖們權力和地位的維持依賴於社會秩序的穩定性，因此他們領導的工人運動也更傾向於採取改革和漸進主義的策略。英國工黨是在工會運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工會把工黨視為保證議會中日益增加的工會成員發揮作用的工具。²⁴

國家的政策和態度，對工人運動發展模式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它決定了工人運動的策略選擇，以及與國家的互動方式。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很早就指出過，國家暴力的使用是導致德國和英國的工人運動走上兩種不同的政治發展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²⁵ 壓制性和排斥性（exclusive）的勞動體制迫使工人運動激進化，走上與國家對抗的道路。這種情形實際上不只是歐洲大陸早期工人運動的寫照，二十世紀許多欠發達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同樣的狀況，如韓國、南非、巴西，以及許多拉美國家都曾出現過對抗國家的激進工人運動。²⁶ 但歷史發展到今天，國家吸納和制度化工人運動已成為世界潮流。如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說，在二十世紀，「勞工組織被普遍認為是工業社會的一個自然特徵。所有發達國家都有大規模的和組織良好的工人運動，因此落後國家也希望有這樣的工人運動。一個全國性的勞動聯盟對於國家尊嚴來說，就如同軍隊、民航和外交部一樣不可缺少」。²⁷ 基於各國歷史和政治傳統而產生的國家吸納工人運動的不同方式，如多元主義（pluralism）、社會法團主義（social corporatism）、國家法團主義（state corporatism）等，又反過來深刻地影響著工人運動的發展。

公民權：普選權和政治參與

在有些學者看來，國家強弱與工人運動之間的關係並非那麼顯而易見。比如，卡茲尼爾森就指出，歐洲大陸國家的工人運動並沒有顯